

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1}

陈雪明 卞利

【摘要】：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整合宗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程元谭；家谱；徽学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8)03-0001-08

宗族的始祖或始迁祖形象，是由杂糅历史真实与传说故事的宗族群体记忆逐渐形塑而成，是一个宗族族群祖先信仰和祖源观念的集中反映。它所解决的其实是一个宗族族群的源流谱系问题，是划分“我群”与“他群”的一把标尺^[1]。宋元以来，随着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三次移民高峰的完成，至明清时期，徽州逐渐发展成为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宗族发展异常繁荣。无论大小贫富，徽州几乎每一个宗族都会通过纂修族谱等方式，建构本族的远祖形象。这些远祖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趋势，而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目前，学界对程元谭的研究业已取得一定成果^[2]，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宋元以来程氏宗族建构始迁祖程元谭形象的文本演变、社会认同过程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建构与演变：程元谭在族谱及相关文献中的记录

综合明清以来徽州方志、程氏宗族族谱及相关文集记载，有关程元谭的生平及事迹可概述如下：

程元谭，洛阳人，新安程氏宗族始迁祖。在晋元帝平定东阳、信安等六郡后，程元谭以镇东军谋身份出任襄州刺史。大兴年间，因军功显赫、安定一方，被授为新安郡太守，秩二千石。因施仁政，政绩斐然，深受新安百姓爱戴。任职期满调任时，百姓不忍其离去，群请其留下。事为晋元帝闻知，对其予以褒奖，于歙县黄墩(篁墩)赐以田宅，程元谭因此成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南宋德祐元年(1275)，朝廷追封其为“忠佑公”。其墓在“郡城(今歙县——引者注)西十里驿路之旁”^[3]，墓地广袤，墓前有双石人。因年代久远和后裔迁徙等原因，程元谭墓曾一度湮灭。程元谭后裔中显赫者代不乏人，其中较为知名者有萧梁时“忠壮公”程灵洗、宋代学者程大昌和明代学者程敏政等。

尽管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徽州程氏族谱均有始迁祖程元谭事迹的记载，且谱系脉络清晰，但在宋代以前的程氏族谱及相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间规约文献集成”(14ZDB12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徽州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研究”(AHSKY2015D129)

作者简介：陈雪明，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30039)；卞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关文献中并无关于程元谭的文字记录。事实上，程元谭真正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文字记录，在宋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我们将现存程氏族谱和有关文献中关于程元谭的记录加以梳理，大致可将程氏宗族始迁祖程元谭的建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宋代以前(不包括宋代)，现存程氏宗族各类族谱中并未见有程元谭的文字记录。因唐末五代动乱，之前的徽州程氏宗族谱牒基本亡佚，我们仅能从后世程氏谱牒中所保存的唐代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程洵所撰《程氏世谱序》中窥见一二。但程洵在序中仅将祖先追溯至忠壮公程灵洗，并未对程灵洗之前的世系进行追溯，更无程元谭的只字记录^[4]。

2. 两宋时期，“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形象开始出现，但十分模糊，且并未得到程氏族人和地方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同。目前所见最早在族谱中提及程元谭的是北宋庆历三年(1043)程承议所撰《程氏世谱序》，该序文云：“程氏自晋新安太守元谭公留居郡城，历唐迄梁，代有显者。”^[5]其后，程氏宗族族谱大多因袭这一记载，“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始居新安”“得赐田宅”这些文字相继出现，如北宋程璇所撰《程氏世谱序》即云：“东晋元谭公自洛阳过江，居新安之黄墩，传至忠壮，凡十三世矣。”^[6]南宋端明殿学士程秘则在《世忠庙碑记》中自称：“(程氏)由忠翼而来，三十二世而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7]南宋宰相程元凤撰文称，程元谭“东晋大兴三年假节新安太守，百姓请留，诏从民便，仍赐田宅于歙之黄端，子孙因家焉，遂为新安著姓”^[8]。可见，在这一阶段中，程元谭的事迹、谱系、官秩及所获封赐等信息得到初步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并未获得程氏族人的一致认同。北宋绍圣二年(1095)，程祁在撰写的谱序中仅自称忠壮公之后，未提及程元谭^[9]。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撰写宗族谱序时则采用了疑问句式：“则吾宗之来此者，其东晋元谭公乎？”^[10]显然，程大昌对始迁祖“元谭公”的身份持怀疑态度。而在程氏族谱所记载的南宋末年对程元谭身份“认定”十分重要的追封诰敕中，程元谭为“忠壮公(即程灵洗)远祖”的身份，相对于其“新安太守”的名义和政绩显得更为重要^[11]。由此可见，程元谭是因程灵洗在南宋时期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而得到册封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在南宋时期，无论在宗族内部还是在徽州社会中，程元谭的事迹和形象尽管得以初步建构，但其影响力微不足道。不过，也正是从南宋开始，作为徽州程氏的始迁祖，程元谭逐渐在程氏宗族之外的群体中取得了部分认同，如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为宋代黟县名臣程叔达撰写墓志铭时，便称其“胄自重黎，氏自伯休及婴，晋元谭守新安，民德之，诏赐田宅于歙，因家焉”^[12]。但是，现存最早的徽州地方志、南宋罗愿所纂淳熙《新安志》中，东晋牧守序列里并无程元谭的记载^[13]。检索《晋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亦皆无程元谭的文字记录^[14]，这说明程元谭在当时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3. 南宋后期至元代，程元谭的形象渐趋清晰，社会认同度亦日渐提高。在这一阶段中，程元谭任新安太守的具体时间开始明朗，并被形塑为一个生平清晰、政绩斐然、怀德爱民的地方官员。宋元之际，方回在所撰程元谭碑文中云：“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程公讳元谭，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大兴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卒于郡，永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歙之程氏自此始。”^[15]元大德年间，紫阳书院山长程逢午则在所撰程元谭墓志中称：“徽之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谭始。晋元帝兴江左，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安郡。及代，百姓遮留，不得发，诏褒嘉之，赐第于新安之歙县，子孙家焉。其墓在州之西十里，今名‘双石前’，盖指墓前二石人也。有地广袤，可容数万人。”^[16]我们且不论这些记载是否系后人假借前人之手而为之，这至少说明，在元代，程氏族人对程元谭的任职时间、政绩、待遇、墓地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添加和建构，前后的世系脉络也记载得十分清晰，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与广泛认同。郑玉在其所作《重修忠烈陵庙记》中，曾提及“歙县有古邱墓，凡三，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墓在予所居贞白里中，今唯双石人可识，然沉沦土中殆尽矣”^[17]。赵汭为休宁籍官员程愿学作“行状”时，亦称“其先自晋新安太守元谭，以治郡有绩，锡褒诏赐田宅于郡，因留家焉”^[18]。可见，在元代中后期，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的形象在程氏宗族中已深入人心，其政治形象也得到了一些社会贤达的认同。

4. 明清时期，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的事迹和形象不仅在徽州程氏宗族各类谱牒文献中被不容置疑地记录，并更加完善，而且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认同。尽管各种程氏宗族谱牒对程元谭的记载略有出入，但都大同小异。其中，程敏政综合各家之说，对程元谭事迹进行全景式记述，堪称程元谭始迁祖形象建构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将程元谭视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云：“一世太守府君讳元谭，为人清洁敏达，晋怀、愍时历广平太守，值胡羯之乱，失官，弃家徒步归琅琊王，为镇东军谋，从之渡江。……大兴三年……府君以襄州刺史假节行新安太守，绥辑流民，疏通畎浍，教民孝弟，举俊造于朝，歙民爱之如父母。永昌元年，代还，百姓遮道请留，卒不得去，诏褒嘉之。俄卒于郡，元帝闻为之惊惜，赐田宅于郡之篁墩，是为

徽州程氏始祖。墓在城西十里袞绣乡二十三都，墓前有双石人，历宋元无恙，土人思之，名其地曰双石，出郡志及碑。宋以府君裔孙忠壮公庙祀有灵，用越国汪王追爵上世及子孙例，封公为忠佑公，封忠壮子为忠护侯。”^[19]显然，程敏政关于程元谭的记录已非“一家之言”，而是有了更加正规和可信的依据，即“出郡志及碑”。在此之后，徽州各类程氏宗族的谱牒大多采用程敏政之说，从而完成了对程元谭这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事迹和形象的建构。清代程氏族谱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元谭祖，初历江阳太守，转襄州刺史。……公为镇东军谋，辅晋王即位江东，是为元帝，号东晋。……大兴三年，新定、东阳、信安六郡既平，以襄州刺史假节镇抚新安。公任太守，绥辑流民，疏通畎浍，教民孝弟，举俊杰造于朝，歆民大悦，立遗爱碑亭。永昌元年，秩满代还，百姓遮道请留，卒不得发。帝闻而嘉之，诏褒赐第新安歙之黄墩，子孙遂因家焉，是为新安程氏之始祖也。歿于晋明帝太宁二年乙丑，享年八十有一。宋追封忠佑公。葬郡城西十里驿旁，制二石人于墓前，遂名其地曰双石。”^[20]程元谭的人物性格、仕途经历、卒年^[21]等具体信息在这一阶段得到完善。至清代康熙年间，祖先程元谭对于程氏后裔而言，已成为一种固然的存在：“东晋元谭公以太守赐第世居……予自志学以来，固已闻之孰矣。”^[22]徽州地方的学者和社会贤达也都接纳并认同程元谭这一人物的客观存在，如休宁儒学教谕张日孜为程氏族谱撰序时即称：“又推而上十四世则新安太守元谭公也，自北而南为新安始祖。”^[23]歙县学者鲍宁为程氏族谱撰写序文云：“其迁南而居新安也，又由元谭公始，东晋大兴二年，公由广平太守假节守新安，有德于民，及代，遮道请留，卒不得发，诏褒嘉之，赐第于新安之歙邑，子孙家焉。”^[24]这一记载因鲍宁参与地方志纂修而被收入弘治《徽州府志》。汪道昆亦在其《太函集》中多次提及程元谭^[25]。而编纂立场较族谱更为客观，且有着先后承袭关系的《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这两部地域性名族志，亦将程元谭作为新安程氏宗族的始迁祖^[26]。至此，程元谭这一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形象不仅在程氏宗族中得到完全认同，而且还为徽州其他小姓所仰慕。一些小姓冀图通过各种手段攀附，借以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如清康熙年间，世忠庙庙祝方氏冒姓冒祖，徽州程氏宗族即以“始迁祖程元谭”为旗帜而团结在一起，并为守护千年太守墓而引发大规模宗族诉讼案件，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27]。

综上所述，在程氏族谱和后裔及学者的文献著述中，“始祖程元谭”从宋代开始进行初步建构，其后不断强化和完善其事迹与形象，至明代中期程敏政时大体完成建构过程，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程氏宗族和徽州地方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同。除祖先事迹和前后世系的建构，程氏宗族还通过祖先祭祀^[28]、祖先画像^[29]、祖墓修建^[30]及维护、创建祠堂（如休宁世忠行祠^[31]）等手段和途径，深化族人对程元谭的“祖先记忆”，使“始迁祖程元谭”在程氏后裔中不断得到群体认同，且地位不断巩固。

还应指出的是，认同程元谭为徽州宗族始迁祖的程氏宗族，并非纯粹都是有着共同血缘关系的程氏宗族。实际上，除了原生的程氏宗族之外，还有后来附加进去的其他外姓宗族联合体。对此，宋人程璇在《程氏世谱序》中曾称，“今新安尚有呈姓，多慕忠壮之风，辄改呈附程氏者有之矣”^[32]。甚至远至江浙，“士大夫非程氏族姓，而自言系出黄墩者甚多”^[33]。明代学者程敏政亦一度被视为外姓冒族，有人甚至指责其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的目的就是为了“冒祖附族”^[34]。也就是说，在程氏宗族发展的历程中，在遗漏了部分弱小宗支^[35]的同时，还吸纳了一部分当地的外姓宗族，这些外姓因仰慕程氏之望族地位而不惜冒族攀援，自称“元谭公后裔”，并参与了程元谭始迁祖地位的形塑与建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形象的建构和宗族认同的确立，是以程氏宗族精英为主体并有非程氏宗族成员共同参与、彼此互动的结果。

二、强化与巩固：官方和社会对程元谭的认同

宗族祖先在本族谱牒中如何记载，其影响并不显著，但当这种记载同样出现在官方文献中，其性质就大不一样了。

梳理官方文献可知，从明代至民国的一统志、省志和徽州各种方志中也大多记载了程元谭的事迹。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记录了程元谭的事迹，云：“程元谭墓，在府城西十余里，晋太守程元谭葬此。旁有二石翁仲，因名其地曰双石。歙有程氏，皆祖元谭。”^[36]而弘治《徽州府志》中对程元谭的记载与程氏宗族谱牒的记录如出一辙，不仅在“名宦”部分对程元谭事迹详加描述，而且在“词翰”中收录了程逢午的《晋新安太守程公墓记》和程敏政的《婺源高安程氏世忠祠记》^[37]，文中均称程元谭为徽州程氏始迁祖。之后的歙县和徽州府等方志中基本因袭这一记录，如明万历《歙志》、清乾隆《江南通志》、清乾隆《大清一统志》、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以及民国《歙县志》中均有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墓在歙县西冷水铺的记载。乾隆《歙县志》在记载“篁墩”的来源时，为阐释篁墩历史久远，称“东晋程元谭为新安太守，赐第宅于篁墩，篁墩之名古矣”^[38]。

道光《徽州府志》与弘治《徽州府志》的记载基本一致，称：“程元谭，东晋时持节为新安太守，有善政，诏赐宅于歙篁墩，子孙遂以为桑梓，见宋胡麟《程灵洗庙碑》。太兴初，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在郡为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永昌元年卒于郡，子孙家焉。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新安有程氏自元谭始。”^[39]与徽州毗邻的浙江省的志书中，也出现了程元谭的记录，雍正《浙江通志》将“程元谭”列为晋元帝时“新安郡太守”之一^[40]。这些都是从官方文献的立场认同了程元谭在程氏宗族和地域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除了文献记载，徽州地方官府还为程元谭修建祭祀性建筑，如徽州府城南门外的尚贤祠^[41]、遗爱堂(又称名宦祠)^[42]和休宁县率口的遗爱亭^[43]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从明代开始“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便得到官方的认同。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程敏政不仅与《大明一统志》的主纂李贤有着翁婿关系，而且还同《大明一统志》编修人员中的多人存在良好的交往。而弘治《休宁县志》则为程敏政所撰，将本族认可的始迁祖收入志书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曾为程氏族谱撰写过序文的鲍宁，也因参与弘治《徽州府志》纂修而将程元谭收录进《徽州府志》。因此，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得到官方认同，是程氏宗族通过自身影响和各种社会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官方的认同，在民国时期则催化了一场以地方宗族胜利收尾的“官”“民”较量，其影响力从地方宗族渗透和辐射至徽州地方行政机关，使“程元谭”在徽州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更进一步巩固与强化。

1935年，国民政府拟修建京溪铁路(即今皖赣铁路)，江南铁路公司勘测设计的“徽屯路”路线，正好穿过程氏宗族世忠庙址，需要截去世忠庙基西面一角，这便意味着一旦修建铁路，动工挖土，祭祀程元谭的统宗祠和程灵洗的忠壮庙等“原有祠庙屋宇势必震撼坍塌堪虞，不独民族历史上之古迹横被摧残，而地方人民亦同失瞻依之所”^[44]，程氏族群情惶骇，积极呼吁。从1935年底至1936年底，程氏族人邀集旅京、沪诸族人，成立“驻屯篁墩程氏重修祠庙办事处”，并以“湖南醴陵派颂云总长、绩溪仁里派士范宗台为阖族代表”^[45]，分别向江南铁路公司、京溪路局和铁道部呈文，要求“将已测路线改在祠庙门前石栏杆墻下田内，转入庙西下首空地钉线，仅须移下数丈之间”^[46]，以保全祠庙完整。甚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程潜也积极参与进来，亲自致函铁道部，恳请更改路线。最终在1936年11月26日，铁道部部长郑华发表公函，同意了程氏宗族修改铁路路线的请求^[47]。这成全了程氏宗族尊祖敬宗的心愿，更坚定了他们维护祖先祠庙的信念。而“程元谭”这一人物概念也通过这一事件，成为地方社会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可见，程氏宗族所建构的这一祖先形象不仅在宗族内部得到认同，而且取得了官方和地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反过来对地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三、建构和强化始祖形象的原因

通过“宗族—官方—地方社会认同”这一演变历程，“新安太守程元谭”已然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地方精英。他不仅以各种方式“真实”地存在着，甚至还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晋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中并无程元谭作为东晋新安太守的相关记载，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渡江祖先”，在程氏宗族谱牒和徽州方志中则呈现出“时间越往后，形象越清晰”的演变趋势，而这种越来越清晰的祖先形象，可能与事实上的程氏远祖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因此，其真实性在明清时期曾一度遭到质疑。明清之际的歙县文人黄琯撰文称：“夫元谭之迹，不见正史，而方回者邪妄人耳，其碑何所据依?特述数百年以前之事，容知非程氏子孙夸大其先，妄造此说，使回笔之于碑耶?”^[48]清代学者阎若璩亦对所谓的“太守持节”一事产生怀疑，认为程氏族人“自夸大其远祖，而不知国典朝章”^[49]。至于程氏宗族后裔程敏政，则对这一问题存在相当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程敏政对程氏宗族世系进行考证，认为“(程)祁谱谓十一世至汉历简侯黑，黑传二十世至新安太守元谭，中间无一人一事见于传记，今不敢从”^[50]，对“程元谭”的真实性产生疑问；另一方面，他又在《新安程氏统宗世谱》《程氏贻范集》《新安文献志》和《篁墩文集》等文献中多次强调徽州程氏宗族始于程元谭。而“程元谭”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和强化过程，却又与程敏政对其认同和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清代程豫对前代谱书中的远祖记载，亦曾表示过怀疑，并进行了烦琐的考证，指出旧谱中关于程元谭记载中的问题，但最终只

以旧谱“或别有所据，亦未可知”，同时强调本族“崇爵显位者，代有其人，不必观于图谱，始知为海内著姓”^[51]而草草收场。可见，只要稍加考证，程元谭及其事迹的记载便经不起推敲。然而，为了凸显本族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他们又不愿点破这一问题的要害，相反，却不断建构和强化程元谭的事迹、形象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对此，我们尽管不能断言“程元谭”这位徽州程氏始迁祖不存在，但至少可以说其“新安太守”的身份有虚构的成分。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建构这一历史真实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宗族在重构始祖或始迁祖形象、强化祖先记忆方面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学者们通常采用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这一著名假设来解释这类现象，我们不妨引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概念来理解这一问题，将“考古”一词比喻性地引入传世文献研究，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宗族祖先形象的形塑过程，将民间文献和官方文献作为“档案”理解为一种陈述系统，“它通过片段、区域和层次呈现出来”，即将这一演变过程理解作为一种思想史，“它构成一种分析的方式，一种透视法”，它所描述的那些知识“是为后来的形式化作经验的未加思考的背景”，“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重建”^[52]。

从徽州程氏宗族对程元谭始迁祖形象的建构这一个案中，我们认为，对宗族始祖或始迁祖形象的建构与强化，根源于以下几种复杂的因素：

第一，始祖或始迁祖对宗族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始祖或始迁祖传说为主要形式，建构和强化始祖或始迁祖形象，实际上既是宗族族群认同的结果，也是宗族控制强化的体现。在宗族族群形成过程中，文化心理的主观认同可能比实际存在的血缘和地缘等因素更为重要。对个体成员而言，就是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祖源谱系^[53]。本文讨论的个案所直接反映的事实是：由一个宗族为核心而形成的人群的聚合，根据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依据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某个时段建构出宗族群体共同认可的“始迁祖形象”，并通过种种方式和手段，不断对其进行强化与传播，率先在宗族成员中形成群体认同，人群亦因此能够鲜明地区分“我群”和“他群”而逐渐成为自身族群的标识。所谓“人道莫大乎亲亲，亲亲之道莫大乎明族属、知世系也。夫水之支流虽异，而源则同；木之枝叶虽分，而本则一；人之子孙虽殊，而出自其祖者，未尝有间。能知乎此，则不以世代之远间其亲亲之念，族由是睦，风俗由是无所漓，此谱系之书不可不作也”^[54]。而“程元谭”在此过程中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作为一种“宗族标志”而存在，无论后世子孙迁徙何处，“每观家牒，知自篁墩出”，而篁墩正是程元谭始迁新安之所。这样，程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将我族与他族清晰区别开来，从而能够更加明确地以本宗族为核心，共同维护本宗族的群体利益。

第二，统宗合族的需要。正所谓“人之生也，本之为祖，统之为宗，散之为族。祖也者，吾身之所自出，犹木之根也”^[55]。为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的，宋元时期的徽州宗族非常重视考辨本族的始祖和始迁祖。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宗族逐渐乡约化，族规家法大量出现，宗祠与族谱也大规模纂修。重构祖先世系，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展的需要^[56]，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宗族自身的发展，宗族内部人心涣散，亦急需塑造一个宗族共同认可的祖先，维系宗族成员的情感，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进行跨地域的联宗活动，以增强本宗族与其他宗族抗衡的力量。“盖人伦不明，宗法废弛，民俗颓弊甚矣。……由是海内之士，闻其风而兴起焉者，莫不家有祠，以祀其先祖；族有谱，以别其尊卑。”^[57]阐明宗族来源，厘清族姓源流，才可以达到“虽族散万途，而宗归一本”^[58]的目的。程氏宗族亦是如此，他们利用正月行团拜礼，合族共聚的时机，“拟写新安太守元谭公像，每遇正旦，悬之高堂，子孙瞻拜，然后序昭穆”，并告诫子孙，“不以遐远而忘者，忠孝之至也”，以此作为聚族的良方，认为“久而行之，则族谊由是而敦，风俗由是而美，又岂非程氏一美事乎”^[59]。

第三，确立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名族”身份，建构符合正统规范的祖先，巧妙地将本族纳入王朝官方系统内，以占据更有利的社会地位，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争夺社会资源的能力。“循俗重门族，凡仆隶之裔，虽贵显，故家皆不与缔姻”^[60]，而成为地方大族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存在被官方历史记录并认可的本族精英人物，而这一精英人物的历史又必须足够悠久，方能容纳不同支族对自身历史叙述和认同的空间。这样，他们对外形成一个统一的望族大姓，对内则保存着彼此之间清晰的区别^[61]。从政治层面而言，地方宗族势力的不断拓展和膨胀，实际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地方政权组织的不安，形成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挑战，而地方宗族则要设法调节并缓和这种矛盾和冲突。徽州程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地

方宗族势力迅速发展和膨胀的阶段，必须通过建构始祖或始迁祖形象，并赋予其名门仕宦的身份，以强化宗族群体的祖先记忆，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声望，突出本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名族身份和主导地位，增强他们在地方上的话语权和提升宗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通过这种文化上的调适，程氏宗族将始祖程元谭塑造成勤政爱民、安抚一方的精英形象，这“既符合儒家的基本伦理，也符合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对清廉勤政的共同要求，因此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共同的承认”^[62]。而在徽州地区，不仅仅是程氏宗族，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大族，如黄氏、张氏、朱氏、王氏、胡氏等等也竞相于宋元时期，在族谱中对其始祖或始迁祖进行建构，并在“始祖迁居篁墩”这一事件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63]。

同时，我们发现，徽州程氏宗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科举入仕和从事商业经营等途径，进行宗族实力的积累和势力的扩张，具备了重塑始祖形象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徽州程氏宗族从南宋中后期开始，族人科举入仕不断成功，为官群体也愈发庞大，并出现了休宁地区累世科第的盛况^[64]，确实可谓“新安望族，蕃衍盛大，家有诗书，世传簪笏”^[65]。而族内经商者亦人数众多，尤其是歙县槐塘程氏族人，“业鹺两淮”者颇多^[66]，《淮安河下志》中便有程氏族人迁居淮安，从事盐、典等商业活动的记载^[67]，程氏亦有家谱称“族人或仕于朝，或耕读于野，或商贾于外”^[68]。可见，在此过程中，地方宗族依靠政治资源来建构“真实”的显祖，提升本族的社会地位，在取得地位和影响之后，又借此争夺地方资源，进一步扩充宗族的实力，从而促进宗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另外，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有着浓厚的夸耀祖先的文化氛围，以此表达尊祖敬宗的心意。程氏宗族便曾专门编纂《程氏人物志》，将“程氏人物自周伯符祖得姓以迄今，迂衍遍天下，其间勋名迭著者”予以记录，其目的自然是“炫人耳目以侈氏族之光”^[69]了。而始祖的真实性问题，既不会去怀疑，更是不容外人置疑了。

注释：

[1] 参见祝立业《从碑志看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2] 常建华：《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章毅：《迁徙与归化——〈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黄国信、温春来：《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林济：《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林济：《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林济：《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方光禄、曾小保：《徽州大姓对新安始迁祖的追溯与还原——以篁墩程氏为中心》，《黄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冯剑辉：《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3] (元)方回：《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4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 (唐)程洵：《程氏世谱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5] (宋)程承议：《程氏世录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6] (宋)程璇：《程氏世谱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7] (宋)程珌：《洺水集》卷7《世忠庙碑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8] (明)程敏政：《程氏贻范集》乙集卷4《程氏宗祖墓铭》，明成化十八年刻本。

[9] (宋)程祁:《程氏世谱序》, (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 明隆庆四年刻本。

[10] (宋)程大昌:《休宁会里中泽谱序》, (明)程孟纂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程氏谱序”, 明景泰二年刻本。

[11] (明)程亨纂修:《陪郭程氏敦本录》卷之下《浩敕·忠壮公远祖元谭追封忠佑公诰》, 明弘治五年刻本。

[12]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 125《宋故华文阁直学士赠特进程公墓志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61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13] (宋)罗愿:《新安志》卷 9《牧守》, 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14] 冯剑辉指出,《新安志》漏载太多,未记载程元谭不能作为其不存在的证据,而正史中未记载程元谭,也最多只能“推论其‘可能无’,而不能断定‘必然无’”(《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

[15] (元)方回:《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 45。

[16] (元)程逢午:《晋新安太守程公墓志》, (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 14。

[17] (元)郑玉:《师山集》卷 4《重修忠烈陵庙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18] (元)赵汭:《东山存稿》卷 7《长乐县程令君行状》,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21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19] (明)程敏政纂修:《休宁陪郭程氏本宗谱·事略》, 明弘治十年刻本。

[20] (清)程善述等纂修:《褒嘉里程氏衍庆世谱》卷首之二,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21] 按:程元谭卒年说法较多,一说其歿于永昌元年(322 年),见《新安文献志·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道光《徽州府志》卷 8《职官志·名宦》等;一说太宁二年(324 年),见《褒嘉里程氏衍庆世谱》卷首等;甚至还有永昌六年(无此年代)说,见《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卷 1《江东派》、《祁门善和程氏谱·谱辨》等。

[22] (清)程佳璠:《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大成序》, (清)程公惠纂修:《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 清乾隆元年刻本。

[23] (明)张日孜:《陪郭程氏敦本录序》, (明)程亨纂修:《陪郭程氏敦本录》, 明弘治五年刻本。

[24] (明)鲍宁:《程氏会通谱序》, (明)程孟纂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明景泰二年刻本。

[25]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 16《海阳程次公七十寿序》、卷 21《长原程氏本支谱序》、卷 69《潘氏宗祠碑记》, 胡益民等点校, 合肥:黄山书社, 2004 年。

[26]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前卷, 合肥:黄山书社, 2007 年, 第 18 页; (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卷 1, 合肥:黄山书社, 2007 年, 第 69 页。

[27]参考(清)程有高《新安程氏世忠原录琼公支谱》卷10,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拙作《孰输,孰赢:清初程元谭墓地盗葬诉讼案探析》对此案有详细探讨[《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

[28](清)程常宪纂修《大谷程氏宗谱》卷1“祀典规”条便有祭祀“篁墩祖元谭公”的规约,清光绪四年刻本。另外,休宁浯溪(即今龙田浯田村)程氏至今仍在祠楼里供奉程元谭的祖先牌位。

[29]《新安罗祈程氏世谱(残)》卷8《像赞》,明刻本。

[30](明)程昌纂修:《祁门善和程氏谱·程氏足征录》卷4《墓图》,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31]道光《徽州府志》卷2《舆地志·风俗》,道光七年刻本。

[32](宋)程璇:《程氏世谱序》,(明)程尚芳等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33](宋)程大昌:《休宁会里中泽谱序》,(明)程孟纂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程氏谱序”,明景泰二年刻本。

[34]参考林济《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

[35]按:程敏政编修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成为后来程氏宗族修谱的范本,其后编修的程氏族谱,祖先世系等内容大多依据程敏政版本。而程敏政谱在编修时并未统合所有程氏宗支,还有很多宗支因财力有限或其他原因,并未前来“会通”。这意味着程敏政谱及之后的程氏族谱遗漏了部分程氏宗支。参考(明)程文运《(率溪桃梅)程氏重续宗谱》凡例、(清)程士培《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卷14《休宁汉口派》。

[36](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16《徽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7]弘治《徽州府志》卷12《词翰二》,明弘治十五年刻本。

[38]乾隆《歙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39]道光《徽州府志》卷8《职官志·名宦》,清道光七年刻本。

[40]雍正《浙江通志》卷111《职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1]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坛庙》,清道光七年刻本;乾隆《江南通志》卷41《舆地志·徽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2]弘治《徽州府志》卷5《学校·本府儒学》,明弘治十五年刻本;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学校》,清道光七年刻本。

[43]道光《徽州府志》卷2《舆地志·古迹》,清道光七年刻本。

[44](民国)程锡祥:《新安篁墩程氏重修统宗祠世忠庙征信录·呈请铁道部变更路线文》,民国年间刊本。

-
- [45] (民国)程锡祥:《新安篁墩程氏重修统宗祠世忠庙征信录·重修篁墩程氏统宗祠世忠庙缘起弁言》,民国年间刊本。
- [46] (民国)程锡祥:《新安篁墩程氏重修统宗祠世忠庙征信录·呈请京溪路局变更路线文》,民国年间刊本。
- [47] (民国)程锡祥:《新安篁墩程氏重修统宗祠世忠庙征信录·铁道部京衢铁路宣衢段工程局公函》,民国年间刊本。
- [48]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31《篁墩辩二》,李明回等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1135页。
- [49]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6《与戴唐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50]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2《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51] (清)程豫纂修:《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上卷《前谱考异》,清乾隆五年刻本。
- [52]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3~151页。
- [53] 祝立业:《从碑志看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 [54] (明)程蕃:《续谱前序》,(明)程景珍纂修:《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 [55] (明)程一枝:《程典》志卷9《宗法志三》,明万历二十七年家刻本。
- [56] 常建华:《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
- [57] (明)黄云苏、黄禄修:《新安黄氏会通宗谱·集成会通谱叙》,明弘治十四年刻本。
- [58] (明)方桂森纂修:《汉歙丹阳河南方氏衍庆统宗图谱》,明刻本。
- [59] (明)程孟纂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休宁芳干续谱·书元谭公遗像》,明景泰二年刻本。
- [60]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记》,周晓光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893页。
- [61] 章毅:《迁徙与归化——〈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
- [62] 冯剑辉:《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 [63] 冯剑辉:《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 [64] 参考赵龙《宋代徽州程氏家族进士考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 [65] (元)程逢午:《晋新安太守程公墓志》,(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14。

[66]参考卜永坚《清初歙县槐塘程氏的文化建构》，《史林》2004年第5期。

[67]参考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44页。

[68]（清）程豫纂修：《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上卷“杨云服序”，清乾隆五年刻本。

[69]（清）程之康：《程氏人物志》“凡例”，清康熙四十三年刻本。